

编者按：这段时间，中美经贸谈判的一系列最新消息，让世界极为关注。“华为”登上了全世界媒体的头版头条，甚至都让美国陷入了“紧急状态”。继5月10日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后，美国又扬言将启动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的相关程序。5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行政法令，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禁止美国企业使用有国家安全风险的电信设备。随后，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美国企业不得向华为出口零配件，除非经过美国商务部的许可。到目前为止，中美经贸磋商已进行了十一轮，双方经贸摩擦凸显其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打打谈谈或将成常态。

中美贸易战，核心问题之一，是美方指责中国开放程度不够，要求中国扩大开放，包括开放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从去年3月至今，中美经贸谈判几经反复，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频频提出对华贸易“不公平”“吃亏了”等论调。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美国从没有对中国开放市场，仅仅是同意美国公司到中国市场采购部分产品到美国市场销售。美国政府还在全世界范围全力围剿华为公司，以便扼杀中国的高技术企业，打击中国在发展技术方面的努力，将中国限制在产业的低端，永远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中国是当今世界贸易规则不平等的最大受害者，真正没有遵守WTO规则的是美国政府。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我们要守住底线，因为牵涉到国家主权等核心利益。

5月28日，在2019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国致力于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将在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积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中国愿同各国深化服务贸易投资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向世界展示出开放共赢的诚意和姿态，这与特朗普的“任性”形成鲜明反差。

本期推出“中美贸易摩擦”专题，深入分析中美贸易之间的核心矛盾点，揭示中美之间反复博弈的事实真相。另外，还要把经贸摩擦放在中美关系总体环境变化的角度看，进一步分析新时代的中美变局与世界前途，提出未来我们的改进方向和应对策略。希望为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 中美贸易摩擦

- 02 发动贸易战，美国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 04 5G时代，美国到底在焦虑什么？
- 06 新时代的中美变局与世界前途
- 10 和平共处2.0

人物春秋

- 11 任正非的“宣战书”

政坛经纬

- 14 《政府投资条例》为政府职能清晰“划界”

历史深处

- 15 以史为鉴：美日贸易战往事

悦读时光

- 封三 时代的道德情绪何处安放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戈建虎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发动贸易战， 美国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从去年3月至今，中美经贸谈判几经反复，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频频提出对华贸易“不公平”“吃亏了”等论调，这种论调认为，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存在巨额逆差，中国占了便宜，美国吃了亏，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称，中国是当今世界贸易规则不平等的最大受害者，真正没有遵守WTO规则的是美国政府。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我们要守住底线，因为牵涉到国家主权等核心利益。那么，美国发动贸易战对自身有多大的影响？美国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中国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魏建国在本期思客问答作了详细解读。



思客：美国一边在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一边却横加指责中国对外贸易“不公平”，您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真的不公平吗？

魏建国：在中美贸易当中，中国一直受到美国所施加的对中国不公正待遇。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贸易规则不平等的最大受害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美贸易中，我们只能从美国进口一些普通

的矿产品和工业机械，而真正的高新技术产品，美国不对中国出口。按照WTO规则来讲，这个是不应该的，不能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向另一个国家出口某些安全技术。反观，中国稀土一直向美国和日本出口。另外，自1980年以来，美国国会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一直对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年度审议，直到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美国对中国实行歧视性贸易待遇的做法才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美国这才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第二，中国的补贴政策遭到指责。美国动辄用“301调查”的手段，以及反补贴、反倾销的行为来对中国的一些产品施加不公正待遇。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部分产业和企业提供大量补贴、援助和优惠贷款，包括美国的西红柿和大豆。最近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联邦提出了一项15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举措，旨在帮助受到冲击最大的美国大豆种植户和生猪养殖户。第三，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加工贸易，中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要环节。但是，总体而言，中国产业仍缺乏许多核心技术，利润微薄，而大部分利润却在美国。

思客：面对美国加征关税，中国迅速反击并且亮明了态度，您怎么看？

魏建国：第一，中方迅速反击是希望在中美经贸谈判中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公正的、平等的协议。这个协议必须是要使双方都能够基本满意，如果谈判协议仅仅让一方满意，而另一方的关切和利益没有得到照顾，那么这个协议执行起来也是不会长久的，甚至会被推翻的。第二，贸易战没有赢家，我认为少输则赢，就是哪一方输得少，哪一方就赢。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我们要守住底线，不能美国要求做什么我们就照做。因为这牵涉到核心利益，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主权。第三，中美经贸磋商一年多来，美方不断“变脸”，蛮横无理地推翻协议，

这次又加上一些我们不能接受的条件，最后反而倒打一耙，将责任“甩锅”给中方。

按照少输则赢的原则，我们对美方精准反击，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对此决不能手软，否则会助长美国的嚣张气焰。另外在反击的过程中，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而且要精准反击，同时照顾到国家的利益、企业的利益、消费者和人民的利益。

思客：中国为什么有底气应对这场挑战？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

魏建国：首先，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我们的真心诚意。虽然出发之前对方蛮横无理地增加了关税，但我们还是去了。对方在谈判中多次说话不算话，取消谈判结果，但我们还是抱有诚意，只要对两国都有好处就希望继续谈下去。其次，来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更宽的领域、更深的程度、更高的水平，包括保护知识产权、修订专利法、放宽外商准入等，包括尽快在政府采购、打击假冒伪劣、加大营商环境等方面加大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下调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至3.3%，与此同时，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由6.2%上调至6.3%，有一定的增长，这说明中国有很好的发展潜力。所以我们有底气、有能力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我们的底气来自于中国发展整体向好的局面，来自于上下一致的决心和达成协议的诚意。

思客：美国发动贸易战，对其自身有多大影响？美国真正的意图又是什么？

魏建国：美国发动贸易战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其真正的目标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科技。

中国的改革开放，比美国想象的速度更快、力度更强，更具活力和可持续性。美国借贸易战的方式来打击中国，企图打掉中国的信心，打掉中国发展的基本面，打掉中国老百姓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可。然而综合前面的情况来看，这一招已经有些行不通了。因此美国高官又放出来“文明冲突论”，认为美中之间的冲突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

我认为这些都是美国发动贸易战以后，伴随而生的一个个新招数，对此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特别是在金

融行业、高科技技术方面，以及目前我们领先的一些领域，比如人工智能等。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对它动手，其他类似企业也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

思客：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下去，对外资企业会有什么影响？它们会不会被迫离开中国？

魏建国：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仍在继续，但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更多的投资涌向中国。我想主要有三条理由：第一，亚洲是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而亚洲经济最大的活力在中国；第二，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国2018年全年进口总额14.09万亿元，未来几年还会增长。单凭这一点，如果哪家外企离开了，到头来肯定是肠子都要悔青了。现在很多外企正在拼命地涌入中国市场，比如去年9月，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依然决定在华建设大型独资石化项目，今年1月，美国公司特斯拉首家海外工厂在上海正式开工建设；第三，外企一旦离开中国这个市场，即便最后再回归，它的生产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恢复的。即使恢复了，失去的市场也会带来不少的损失，所以没有企业做这种傻事。

思客：您怎么看华为海思应对美国封锁采取的科技自立的原则？

魏建国：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自力更生，只有自己靠自己来攻克一些高技术、高水平难关。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别人身上是不可信的，别人也不会给你这个技术。我觉得华为做得很好，替我们高科技企业树立了榜样，全球的中国企业都应该向华为学习。

思客：您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前景持何种态度？您认为最好和最坏的结果可能会是什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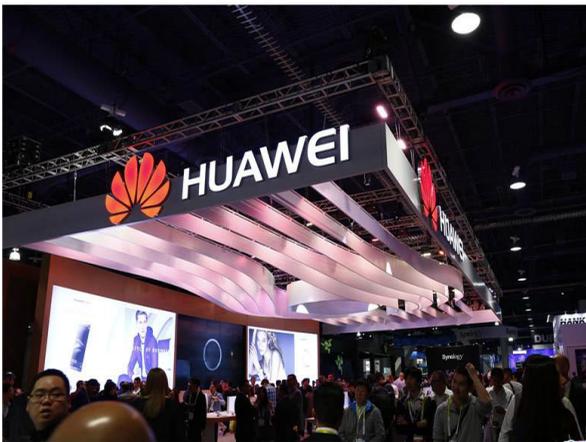
魏建国：中美贸易摩擦肯定是长期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但我不太同意现在一些说法，中美关系已经急转直下，已经到了冰点。其实双方都愿意谈，我想只要能谈，就能达成协议。达成协议以后，出现了矛盾，还可以再谈，再达成协议。我始终相信，中美双方最终能在一个桌子上坐下来谈，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2019-5-27 思客)



5G时代，美国到底在焦虑什么？

2019年4月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其核心观点就一句话：5G竞赛已经开始，“美国必须拿下这一仗”。果真，1个月后，美国政府的5G战略布局已经开始落实，同时另一方面，继续不择手段地打压其中国竞争对手——5G领先者华为。围绕华为，这几天舆论场里也讨论了太多太多。不过，这依然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为什么5G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政府认为其非赢不可，而不能让其他任何国家抢了先机？



颠覆

5G可不是只比4G多了一个G。5G在网络架构上比4G复杂得多。和4G比起来，5G具有超高网速、超低延迟、超广连接的特点，可以说5G是革命性的。如果你是追剧狂人，那么恭喜你，下载一部2小时的电影，通过现有4G网络大约是6分钟，而通过5G网络——你只需要3.6秒。是什么支撑了下载速度的提升？是5G速率的跃升。在最高点时，它能达到4G网络的100倍，达到10Gb/秒的峰值速率。

网速快当然不是美国如此看重5G，甚至不惜“绑架”企业高管、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一个中国企业的理由，就算美国官员中有再多狂热影迷也干不出这事儿。但如果岛叔告诉你，5G能带动很多新兴行业的发展，创造上万

亿经济效益、千万个就业机会，事情似乎就不一样了。

5G的网络时延可以低到1毫秒，远快于人体的应激反应（比如快于人反应的自动刹车，减轻目前VR带来的眩晕感），因为可以广泛地应用于自动控制领域，如无人驾驶、工业控制、远程运维、远程手术。5G具备超千亿连接的支持能力，还可以保证终端的低功耗和低成本。智能家居、物联网、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环境监测都是其应用场景。据高通公司的调查数据，预计到2035年，借助5G提升生产力的产业，将在全球范围内创造12万亿美元的产值，2200万个工作岗位将直接或间接被创造。

如果你觉得这组数据没啥感觉，那我们就放在中美对比中，会更清晰。4月12日，白宫表示，美国的5G网络建设计划投入2750亿美元，将使美国GDP增加5000亿美元，同时创造300万个就业岗位；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中国的5G商用或将在2020~2025年间爆发，可实现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人民币的直接增长及24.8万亿元的间接增长，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都是钱和政绩，美国政界和商界能拱手让人吗？

实际上，根据科尔尼公司的报告，未来制造业的五大核心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高级机器人、3D打印和VR/AR（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都具有变革性和颠覆性，而它们作用在一起，将会完全颠覆传统的商业模式、通信方式乃至全球经济结构。而这些，都依赖于5G这一底层技术。

争夺

5G成为新的国家间“太空竞赛”，的确兵家必争。高通公司的CEO，甚至将其类比为历史上的电力革命。不过目前而言，5G赛道上真正的领头羊就两家——中国和美国。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的《5G全球竞争》报告称，如果将民营企业的5G实验及引入进度、电波分配情况、政府战略等纳入评分考核，从2019年度的情况来看，中国和美国并列第一。就算真如美方报告所言，

中美平分秋色，也绝不是美国政府想要的结果。更何况，从目前美国政界“气急败坏”的表现来看，中国的综合实力应该略胜一筹。任正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清楚地表示，5G技术方面，哪怕美国现在这样打压，华为技术也领先世界2-3年。

实际上，从美国国内看，他们也有5G终端方案提供商（高通），但是没有5G电信设备制造商——这就有点尴尬了。要知道，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四家占据主导地位的5G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爱立信、诺基亚、中兴。欧洲两家，中国两家，三星可以排第5，没有一家美国的。而在5G专利数量上，截至2019年5月，全球范围内5G通信系统标准必要专利的申请中，中国占了34%。下面这张图看得很清楚。其中，华为的专利申请数排名全球第一，美国的高通和英特尔，则分列第六、第八。

计划

为了追赶中国在5G网络建设上的步伐，美国先后制定了许多计划——对，他们一直反对的由国家制订的产业计划。2019年3月，有官员提出将美国5G网络国有化，由美国政府出资建设一个单一的高速移动通信网络，再将接入口出租给AT&T、Verizon和T-Mobile这样的运营商，招致一大堆反对；

4月，美国政府确认，将拍卖更多5G频谱，简化5G审批流程，推动私营企业2019年内在92个城市推出5G网络，设立一个204亿美元的农村数字机遇基金——相当于宣布放弃了5G国有化计划；到了5月20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了全美第三大和第四大电信运营商T-Mobile和Sprint的合并，前提条件是新公司要在未来6年内承建覆盖99%美国民众的5G网络，其中未来3年，该网络将覆盖85%的美国乡村人口，6年内达到90%。

新公司还未成立，政府就对其下达了KPI指标，我们也是搞不清了，在美国，政府和企业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

安全

当然了，要打压中国5G，理由总不能简单是“我们不能光让中国人把钱赚了”，听起来说服力不足。于是，“国家安全”的理由当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2019年4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报告，里面这样说：“5G最大的应用潜力在于对未来战争或军事网络的潜在影响。国防部在未来海外运营时，绝大多数网络和系统可能依赖于

5G基础设施。

如果中国在5G基础设施和系统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那么国防部未来的5G生态系统可能会将中国组件嵌入其中。这将对国防部业务和网络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大家还记得2019年以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反华为”全球巡游——随便他到任何国家出访，都不忘嘱托当地政府不要使用华为设备。其实也不新鲜，这些年美国一直在宣传任正非曾经的军人身份，称中国政府和华为有“特殊关系”，华为会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安装“后门”云云。

有网友用一个段子生动描绘了美国自己行为不轨而反咬华为一口的形象：美国：你们不能买华为5G设备，他们肯定在监听你们。欧洲：你咋知道我们要买华为的设备？美国：默克尔电话上说的……

但是，尽管到处控诉华为的不安全，美国政府至今从来没有证据。其实岛叔2018年8月的一篇文章里就说到过，5G引入了更强的加密算法、隐私保护与鉴权机制，所以比4G安全性更强。它有个重要特性，其无线电接入网并不感知业务、不涉及DPI，也不碰管道数据。它就像遮住双眼的“搬运工”一样，根本不知道搬的箱子里装了什么。这样一来，不管是哪个国家提供5G服务，它都只是一个没有窥探能力的管道，只顾原模原样地输送信息而已。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耳。而著名鹰派、《致命中国》的作者、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的话就更直白了。他说，“在我看来，中国无耻地宣布‘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于告诉全世界：‘未来我们要主宰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因此你们的经济不会再有未来’。”都2019年了，面对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还是有这么些人的脑子停在冷战零和博弈的思维框架里，实在是令人遗憾。哪怕是5G技术领先的中国，也从未将自己封闭起来。比如，诺基亚和爱立信都参与了中国的5G项目。2018年4月，诺基亚赢得了中国5G移动网络建设的一个大合同，将与中国移动共同建设13张城市地铁网和2张省级骨干网。

但是，美国还是有一些政客和媒体自信满满地指责华为窃取美国的技术。任正非回应得好：“华为现在做的东西美国都没有做出来，我去哪里偷他的技术？”

(2019-05-28 海外网)



新时代的中美变局 与世界前途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时代。今天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了从黑暗向光明、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临界点。

一、新时代的中美矛盾：本质和趋势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提出新时代的依据是国内工作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生了转变。但是同时不要忘记，美国也进入了“新时代”。不同的只是一个向着光明和进步的新时代，一个是向着黑暗——本质是反动——的“新时代”。事实上，这两年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国家内外政策出现的180度的逆转，说明世界政治也进入了新时代。如果说昨天的世界政治的特征是和平与发展，那么，21世纪的世界政治特征可能就是战争与和平。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挑战最为艰巨的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进入了成熟的帝国主义阶段。苏联解体后，美国变成一个不受制衡的帝国主义兼霸权主义国家。“911”事件既是美帝国全面统治世界的开始，也是作为美帝国全面衰落的开始。小布什假“反恐”之名向世界统治权力发起冲锋，想不到美国在小布什“一鼓作气”之后便进入奥巴马时期的“再而衰”阶段。为了扭转美国的颓势，特朗普一改尼克松为美国建立的依赖石油美元、以石油美元拉动美国金融并以强大的金融掠夺世界财富的政策，将美元增值的依赖路径从石油移至军工；割羊毛不成便要杀羊，喝血不成便直接杀人。这时的美国已前所未有的表现出它的最凶恶，同时也最虚弱的纸老虎本质。

华为事件，孟晚舟事件以及一系列对在美华裔科学家迫害持续升级事件说明，中美关系已进入类似20世纪

20年代国共合作中断的“四·一二”前期，在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登场前夕。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只能归结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1925年年底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此讲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也只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认清美中关系的这场变局及其后果。

二、外因是由内因引起的，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

造成美国目前外交政策的上述转变，还有其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因素。与20世纪略有不同的是，21世纪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对象已从南方世界扩大到北方世界。殖民地现象从第三世界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北方国家内部倒逼——这是21世纪初帝国主义腐朽性最突出的特点。由华尔街国际资本对美利坚民族的压迫导致美国劳动者阶级以及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的最广泛阶层与华尔街及其买办集团的阶级斗争，已上升为美国国内的基本矛盾。

列宁说：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发现的国家，而且在老牌国家也在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1942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审改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时，加写这样一段话：总之，极端毒狠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如果将这段话中的“日本”换作今天的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也会让人觉得很贴切当前的美国形势。

“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今天美帝国的统治中心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今天的美国是民族政治的中心白宫屈从于国际垄断资本中心华尔街。因此，2001年的“9·11事件”打击的对象是世贸大厦而不是白宫，

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的运动；以往美国人民运动是“进军华盛顿”即直接以政府为对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国人民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与早期的工人砸机器行为不一样，而与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些相似，这两大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也较早觉悟的人群。这说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民族正在觉醒：不管这种觉醒是自为的还是自发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世界问题的要害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造成美国危机的原因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化解，美国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今天的美国人民似乎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意识到垄断资本的阶级压迫。2019年2月9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在其家乡劳伦斯发表演讲，宣布她正在争取党内提名竞选总统，在2020年向特朗普发起挑战。她誓言要改变这个“被富人操纵”的国家，向富人发起“阶级斗争”。

19世纪前半叶欧洲发生普遍革命（比如1848年爆发的遍及整个欧洲的大革命），它造成了欧洲帝国主义向远东扩张（比如侵华和侵印战争）并由此使欧洲垄断资本暂时摆脱了危机，20世纪前半叶西方发生危机，各国再次向东方俄国转嫁危机，结果“偷鸡不成”，反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那么，进入21世纪不久的今天，在北美洲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又造成美国的“战略东移”，其矛盾的焦点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风起于青蘋之末，东风将要压倒西风，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临界点。

三、“特朗普主义”可能选择与世界前途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标志着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特朗普主义”已经启航。“尼克松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它对中国曾有过的友好倾向，而在于它要使美国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基辛格带领美国做到了这一点并由此挽救了美国；表现为一手紧拉中国、一手死打苏联的里根主义，其本质是尼克松主义的强化和继续。所谓“特朗普主义”是特朗普时期内政外交政策的本质

反映，搞得不好，它是尼克松主义与里根主义合二而一的回归，搞得不好，它则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机会主义合二而一在美国的翻版。

今天的特朗普身上有点当年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鲁晓夫修柏林墙，特朗普修墨西哥墙；赫鲁晓夫想跟美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古巴，弄出一个“古巴导弹危机”，这让他灰头土脸，除了美国人民的反感，结果是一无所获。特朗普想跟中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朝鲜半岛，弄出个“萨德”导弹基地，其结果除了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外，也将是一无所获。还有，戈尔巴乔夫放弃华约（“华沙公约组织”），特朗普想放弃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且已经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我支持你可以，但是你得给钱，你得买我的军火。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

尼克松实现其战略目标是具有历史前提的：当时中国、苏联、美国三家处在等边三角对峙关系之中，美国手头也有可与中国交换的——比如它的对台政策——筹码。但特朗普面临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形势：目前中俄关系几乎是无缝对接，根本不存在尼克松时期“等边三角”的拉锯形势，美国目前又无足以动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交换筹码，而中俄两国目前的政治家也相当成熟——不存在中国历史三国时期因贪荆州小利而弃盟的孙权式或苏联后期为讨好西方而主动废国的戈尔巴乔夫那样不成熟的政治家。因此，特朗普今后若要仿效尼克松通过离间中俄关系来获利的外交策略，其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在内政方面，尼克松上台是牺牲美国军工集团、拉拢并得到金融垄断集团支持的结果，但条件是他上台后的政策要使金融资本家集团满意。为此，他牺牲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将美元与石油挂钩。今天特朗普上台是牺牲他竞选演说中竭力攻击的金融集团——他因此得到“占领华尔街”之后美国选民拥护和军工资本家集团支持的结果。与蒋介石上台前后的选择相似，特朗普一上台，立即抛弃美国劳动者的利益转而依靠军工资本集团。但拿钱就得干活，这样，特朗普上任后，通过加大的政府的军工采购，迅速将石油美元转换成军工美元。但军工美元需要的就不是石油而是美国已无力参与的战争——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小型战争，不然特朗普就得不到来自军工集团的持续借贷，就要面对更多的“财政悬崖”。借钱不还而又无东西可卖，特朗普的政治命运就可想而知。

存在决定意识。特朗普上台后的现实环境决定其治国理政思路只能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具体说，就是学习里根，在国内通过拉动军工发展美国实体经济，在国际上开启“潘多拉盒子”，让世界陷入美国并不直接参战且越来越多的战争——最好是世界大战。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这么干的。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在外交上，罗斯福在希特勒欧洲和苏联两面下注。在希特勒兵败斯大林格勒后，罗斯福迅速主动上门找到斯大林并与苏联结下反欧暗盟，战后欧洲便被美苏一分为二。至20世纪60年代，大英帝国及欧洲的海外资产已为美国一揽囊中。

先与希特勒、后又与罗斯福联手搞垮欧洲的斯大林事后看得明白，1952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但斯大林说这话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不能被敌人打倒，不然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及其后果就是前车之鉴。

四 和平还是战争？

这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确没有爆发，这个和平期甚至比邓小平“至少十年打不起来”判断要长得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依赖路径在尼克松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军工复合体”资本集团，当战争结束后，这个集团就反客为主成了左右美国政治的重要力量。在尼克松之前美国外交的重要政策都要优先满足这个资本集团的利益，而新任总统的第一要务是为这个政府财政的最大“借贷方”寻找市场——军工的市场就是战场。因此不断地制造战争便成了这一时期政府的主要任务。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危险，他执政期间结束了朝鲜战争，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

艾氏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今天随特朗普上任再次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集中于华尔街的军工财团——哪怕在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而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必须不断制造敌人。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从而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用于保底——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哺白宫并由此控制美国财政。如果白宫拿钱不办事，摆在白宫官员前面的不是“财政悬崖”就是直接被暗杀——比如肯尼迪总统。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以及在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不但没有转入和平建设，反而又提出遏制理论并继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列宁、斯大林抓住当时历史出现的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机遇使苏联迅速崛起一样，自70年代后期，世界再次出现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苗头，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这点，反复告诉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结果，中国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发展自己，成功实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即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现在的问题又来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失败及欧元出现、俄国、中国的崛起等因素，导致2008年后石油美元的衰落，特朗普又依靠军工资本家的支持，又将美国从石油美元增值的依赖路径转回到军工美元，庞大的军工生产机器已经开动，特朗普接下来的任务如果不是军工产品的销售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天下掉馅饼即苏联自行解体那样的事，那特朗普不追求战争，难道还会追求和平吗？战争一旦成为美国的生意，那和平就成了美国的敌人。反和平，是当今特朗普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的本质。

五、积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与抗战前的形势一样，目前中国学界对中美关系大势及中国在其中的定位存在

着“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两极误判，由此产生出浪漫主义的“速胜论”和悲观主义的“失败论”。在研究方法上，双方都沉缅于西方社会学中的统计方法并将其绝对化，寻找了大量统计数据，得出了“厉害了我的国”或相反的结论。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就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造成这种两极对立的认识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认识论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形成“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目前迫切需要完成的学习任务。为此，当前我们还要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三本书的逻辑关系是：《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从生成、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规律；毛泽东《论持久战》研究的是帝国主义规律在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表现及当地人民如何运用的规律。一百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这三本书中所作的判断是科学和准确的。

黑格尔说过，老人与儿童说的同一句话不是一个意思；同样，老人与儿童同得一个感冒，对他们的身体也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在这样的视域中，今天的美国不管它还有多少强项，它的总趋势是走向衰落，目前为它所做的“病诊”结论是：肾虚火大。肾脾的状况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存在状况，中医病诊总是从肾脾切入的。对国家生命的“问诊”，与此同理。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是这样。有人说彭斯讲话在美国只代表少数人的观点，在美国不占主流。这个说法没有阶级分析方法。什么叫不占主流，资本家只是资本化的人格，彭斯讲话也不是他个人行为，他的讲话在美国代表了大资本的利益。特朗普也是资本化的人格，不管他个人有如何的品质，他一旦进入白宫，他就是阶级的代表。现在整个庞大的军工集团都已经开工，特朗普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天文数的投资，这使美国大批工人有了工作。但他们上班生产的可不是鞋子和袜子，也不是棉花和粮食，

为了还军工资本家的钱，他们只能造武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武器的“市场”只能是战争。资本是讲利润的，而军工的利润不能在一般的市场而只能在战场中实现。

特朗普开工的钱是从华尔街军工集团借的，借钱还债，因此，到处挑起战火，这便是特朗普主要考虑的事。当年里根也是这样，搞星球大战，弄那么大的架势，真是苏联要打仗吗？不是，是美国军工集团要用所谓“苏联威胁”制造开动军工生产从而发动战争的借口，不然美国政府就不能向人民解释为什么要生产这么多武器，就不能动员人民支持政府发动战争。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话所表达的时代内容，也就明白了毛泽东曾预言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的科学依据。由此也就看明白了特朗普凡是和平的，他都要“退群”，凡是战争的，他都要支持和参加的外交特点产生的政治经济动因。

历史辩证法表明，国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国内化，国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则是革命形势的全球化。当前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数国际化的外观形式，“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日益扩大基尼系数正在向金融资本的大本营美国延伸，这说明国际金融资本从全球化中获得剩余价值越来越少，资本全球化已走向尽头，世界形势正在出现逆转。反者道之动，世界历史质变的临界点正在到来。

战争还是和平，光明还是黑暗，是在共同体共存互助，还是在四分五裂中相互杀戮，两种前途再一次推到世界人民面前。两次世界大战已有前车之鉴，我们要放弃幻想，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山雨欲来风满楼。山雨来临，有的人——比如张伯伦、达拉第等——忙着躲雨，结果输得精光；有的人——比如斯大林、罗斯福等——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当雨停的时候，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为了迎接一个光明的前途，已来到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必须在“暴风雨”来临前做好“插秧播种”的准备。

还是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2019-05-04 四月网)



和平共处 2.0

世界经济急需美国和中国的“和平共处”计划。双方都要接受对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展的权利。美国不可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印象试图改变中国经济，中国必须承认美国对就业和技术泄露的担忧，接受因为这些担忧而偶尔受限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和平共处”一词，让人想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冷战期间的和平共处，也许看上去并不那么美丽，但它成功阻止了拥有核武器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类似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和平经济共处，也是阻止两大经济巨人之间爆发代价高昂的贸易大战的唯一办法。

美国与中国在今天的僵局，植根于我称之为“超级全球主义”的错误经济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国家必须向外国公司尽力开放经济，不管这会给它们的增长战略和社会模式带来什么后果。这要求国家经济模式—治理市场的国内规则—存在大趋同，而那些不一致之处会被视为所谓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按照这个范式，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抱怨在于，中国产业政策使美国公司难以在华经营；信贷补贴维持着国有企业的运转，让它们过度生产；知识产权规则让新技术很容易被竞争对手复制；技术转移的要求，强制外国投资者与本地企业组建合资企业；限制性监管在阻止美国金融企业服务中国客户。至于中国，它对其出口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大受冲击，或者其企业窃取技术机密的说法无法容忍。它希望美国在中国对美出口和投资上保持开放，同时中国自身对世界的贸易开放被精心地管理和排序，以避免对就业和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

和平共处需要美国和中国让彼此拥有更大的政策空间，让国内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重要性高于国际经济一体化。换句话说，中国能自由决定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从而构建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美国能自由保

护其劳动力市场免受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的影响，对威胁到技术和国家安全目标的投资进行更多的监督。

反对者称，这样的方针将让世界贸易陷入停滞。但这种看法是基于对开放贸易政策的推动力的误解。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各国之所以贸易，是因为贸易对自身有利。如果它们采取限制贸易的政策，那要么是因为它们从别处得到补偿，要么是因为国内政治失败（比如无法补偿输家）。问题是，国际协定和贸易伙伴无法可靠地区分这两者。即使它们可以，是否能够充分纠正或避免更多政治问题，也不得而知。

许多分析师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其向经济超级大国的转型中起着关键作用。果真如此的话，遏制其产业政策将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以及世界经济的利益。或者，有些人指出，这些政策总体而言对经济有害。但是，即便如此，大部分代价都由中国人自己承担。无论如何，赋权贸易谈判员—以及潜伏在其背后的特殊利益—去解决经济学家也莫衷一是的经济政策的根本性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根据世贸组织成立之前的关贸总协定，当时各国拥有更大的自由采取自己的经济战略，贸易规则比较弱，包含的东西也比较少。但在二战结束后的头35年里，世界贸易（相对于全球产出的）扩张速度，远快于1990年后的超级全球主义时期。

有人会说，这些考虑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必须遵守其规则。但中国进入世贸组织是建立在其已经（或很快就会）成为西方式市场经济的概念之上的。这并没有发生，也没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会（或应该）发生。你不能通过叠加错误来纠正错误。全球贸易机制无法与世界最大的贸易经济体中国相协调，这意味着这一机制亟待修改。

（2019年9期 南风窗）

任正非的“宣战书”

华为遭遇无理打压，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任总主动接受媒体采访，展现了华为光明磊落的一贯风格。任正非先生——一个军人出身的企业家，具有如此高度、格局、胸怀和视野，却又坦诚、理性、智慧、实在，其采访录不仅获得国人集体赞叹认同，也足以成为新闻发言人的经典教科书。不过，相信外国人包括美国政府恐怕还是似懂非懂的。毕竟，东方文明的大智慧不是普通话印在纸面上那么简单，而是其背后的管理思想和战略逻辑。



一、讲姿态——决战前夕的临阵动员

这是一场主动发声的危机公关，长枪短炮、“兵”临城下，阵前“对垒”、毫不怯场。这是一个简洁明了的对话交流，没有寒暄、没有套话、没有躲闪、没有不顾左右而言他，每句话都直奔主题，真诚坦率，完美演绎了“事实、对话、价值观”的危机公关三原则。这是一次坦率交流的媒体群访，记者可以任意提问所有问题，显示了华为的气度与任正非的智慧。这不是宣战，这是宣言。这场危机公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就是华为不会输，更不会倒。虽然任先生身后还有一众高管助阵，但基本上没有发言，少有只言片语的插话，更反衬任先生的功力远高数个段位。

二、讲豪气——不怕战、更不怕持久战

对于美国政府 90 天的延迟禁令期，任先生首先轻描淡写地说：“90 天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对于华为如何应对危机，任先生强调：“在最先进的领域不会有多少影响，至少 5G 不会影响，不仅不影响，别人两三年也不会追上我们的。”对于社会的普遍担心，任先生说：“我们边缘的翅膀可能有洞，但核心部分我们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且是真领先世界。越高端，‘备胎’越充分。”两小时采访不够，没关系，可以继续，不怕持久战。

三、讲胆气——铁肩担道义

谈到一家企业与一国的对垒，任先生说：“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从那时起，就考虑到美国和我们在‘山顶’相遇的问题，做了一些准备。”华为认为自己肯定能继续为客户服务，不会因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受到多少影响，在全球的竞标还是在前进。任先生强调：“不会造成我们公司负增长，或者对产业发展带来伤害。”在自己生死攸关之际，任先生不仅对产业做出“不会伤害”的承诺，还替供应商们打抱不平：“我觉得有时候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打过去打的都是矮的人，其实高的人打不着。”

华为愿意与美国企业休戚与共。华为 2018 年的采购预算为 700 亿美元，其中采购美国零部件就花费了约 110 亿美元。其中不仅有高通、英特尔、微软和甲骨文等巨头，还有很多美国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也都挨了自己政府的板子了。

四、讲骨气——苟利国家生死以

任先生说：“现在也是让公共关系逼着对外，拿来当‘盾牌’到处‘挡枪子’，我就上战场，我老了，打死了就算了，不在乎了。”显然，任先生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但这句话并非想表达“老了、打死了就算了，不在乎了”的意思。联想到任先生还说：“这件

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

烈士吉鸿昌曾作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跪着生，何如立着死？显而易见，任先生的画外音是：就算华为真的死了，也是为国家趟出一条路来，刺激中国自上而下、举全国之力、踏踏实实地发展实业。

五、讲理性——感情用事不足以成大事

华为很冷静。任先生说：“不要和政治挂钩，不能煽起民粹主义的风。”大战前夕，需要排除一切不切实际、无关战略战术的嘈杂之声。“为什么不洗一个‘冷水澡’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冷静、沉着。热血沸腾、口号满天飞，最后打仗时不行也没用，最终能打赢才是真的。”

记者担心，美国政府下一步会不会对台积电这种企业施压？任先生说：“如果外面不屈服的人多了，后面跟着不屈服的人就更多了，我们不要太操心这些，毕竟没有发生。”不过，这确实是华为不能承受之痛，如果真是这样，解决台湾问题会不会就此提前呢？这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国家战略不可能建立在一个企业、一支部队的存亡之上。而且，产业链也不是只有一两个台湾企业。相信华为早有深谋远虑，显然备胎不会只有软体。华为更强调的是：“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理性的人才是大写的人。

六、讲典故——两强相遇勇者胜

任先生讲了两个故事：二战时，德国因为不投降，被炸得片瓦未存；日本投降了，但是大量的工业基础也被摧毁了。华为怎么办？中国怎么办？任先生似乎不经意间提到“上甘岭”。这绝不是任先生的疏忽，而是因为“上甘岭”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华为“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美国政府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相信美国人不会忘记“上甘岭”的前车之鉴。华为告诉世界，他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中国产业链做好准备了吗？

七、讲道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任先生强调的是：“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美国公司的，三十年来美国公司伴随着我们公司成长，做了很多贡献，教明白了我们怎么走路。大家知道，华为绝大部分的顾问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典型的有IBM、埃森哲等，有几十家。”仅仅是为华为服务的美国公司就有几十家，这是告诉美国政客，中美服务贸易逆差是要算大帐的，如其不然，美国服务贸易公司的股价也是保不住的。任先生着重谈到：“美国大量的零部件、器件厂家这么多

年来给了我们很大支持。特别是在最近的危机时刻，体现了美国企业的正义与良心。感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据说，很多美国企业拼命加班，争取赶在禁售令生效之前抓紧出货，这是利益攸关，也是生死攸关，美国企业也有怨气。所以，任先生说：“媒体也不要老骂美国企业，大家多为美国企业说话，要骂就骂美国政客。媒体应该要理解，美国企业和我们是共命运的，我们都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是华为的高度和格局。虽说是“得道”，但不会“任我行”，还是要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追求全球企业命运共同体。

八、讲共存——不作孤家寡人的“西楚霸王”

有人说：“如果备胎好用，何必等到胎破了再用？”任先生直率地说：“胎不坏，为什么要用（备胎）？”“世界上最大的备胎就是原子弹，原子弹有什么用？二战后一次也没有用过。”其实，任先生真正的智慧在于：“我们永远需要美国晶片。每年至少买高通5000万套晶片，因此我们从来没有去排斥和抵制。尽管自己晶片的成本低得多，我还是高价买美国的晶片，因为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应该融入世界。”这让美国企业放心，让所有供应商放心，让全世界商家放心。

任先生还说：“我们不愿意伤害朋友，要帮助他们有良好的财务报表，我们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友好是几十年形成的，不是一张纸就可以摧毁的。”他特别强调：“苹果是榜样，永远是做一把大‘伞’，让下面小厂家都能活。我们想朋友遍天下。”适者生存、赢者通吃是西方商业社会的丛林法则。但是，苹果、华为的境界超越了丛林法则，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华为要扶持生态链包括美国公司创新研发，合作共赢、一荣俱荣，不做“西楚霸王”。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产业链，才使得华为不惧怕美国制裁，甚至不担心两败俱伤。这是大彻大悟的生存之道，也是先知先觉的商战兵法。

九、讲法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任先生说：“美国是法治国家，美国企业不能不遵守法律，实体经济要遵守法律。”华为站在道义与法律的制高点，那正是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任先生说：“我们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如果我们要用他的东西，需要商业交易，是使用美国‘拜杜法案’原则。”这真是“一石三鸟”的语言艺术。这个说法既回应了华为尊重知识产权保护法案，也强调了华为使用知识产权的商业交易原则是依美国法律行事，同时，还隐喻美国政府自己却置美国宪

法于不顾。华为不谈霸凌，直接依据美国宪法，起诉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销售限制条款违背了公权法案条款、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以及三权分立原则违宪。无论美国法院如何裁决，美国法治国家形象都已不可挽回地受到损害。

十、讲拥抱——科技朋友遍天下

科学家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应当拥抱全世界人才。任先生说：“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华为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这是世界胸怀。华为所以不自闭。任先生还说：“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有这么好的基础，应该拿出政策来拥抱世界人才来中国创业。”这是中国情怀。朋友可以遍天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抢到了大量逃亡和战俘科学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又挖走了大量科技人才。“美国大量的领袖、科学家、金融家……都是东欧人，我们为什么不大规模吸引东欧人到中国来，或者在东欧建立各种研究基地？”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中，有50%左右是华人。”美国狭隘地排外，正是中国科技崛起的最大机会。任先生还建议：“要创造外国科学家回国之路”，应当解决他们的孩子上学、没户口买不了车、个人所得税高的难题。中国应当算大帐，用一切办法和优惠政策吸纳全球科技人才。

十一、讲学问——泡沫化不会让我们更强大

任先生说：“这些年经济上的泡沫化，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中国的思想理论学术更不能泡沫化。任先生批评：“现在都是毛毛糙糙、泡沫化的学风，这种学风怎么能奠定我们国家的基础科研竞争力呢？所以，还是要改造学风。”没有脚踏实地，就不会有未来。这不仅是对实业界的郑重警告，也是对理论界、学术界、舆论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当头棒喝。

十二、讲理想——为人类建立庞大的安全网络

华为有一个理想——站到世界最高点。任先生说：“为人类建立这么庞大的网路，就是我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全世界30亿人口是我们联接起来的。特别是非洲地区，因为不赚钱，西方国家不去，是我们去联接起来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是世界性的，世界上接受我们、声援我们的朋友是很多的。”任先生是有骨气有胆气有豪气的：“如果华为不存在了，才是对世界的威胁。”这是因为华为没有“后门”，对世界不存在威胁。但是，没有华为，世界各国都将面临真正的威胁。

任先生还说：“5G并不是原子弹，而是造福人类社会的。”华为更有大气，“希望美国公司继续能给我们供货，我们共同为人类服务。”也正因为如此，华为才能占到世界最高点。

十三、讲格局——中美在山顶交锋然后拥抱

美国打压华为，大家憋不住了，喊出口号，要“争雄世界”、“世界第一”。任先生说：“以前我们是不允许喊的，为了这个理想，我们与美国迟早有冲突。”今天，两军对垒，战鼓声必须震天。特朗普前国师史蒂夫·班农近日说，干掉华为比达成中美协议重要十倍。可见，唯有再打一场上甘岭，才有可能最终言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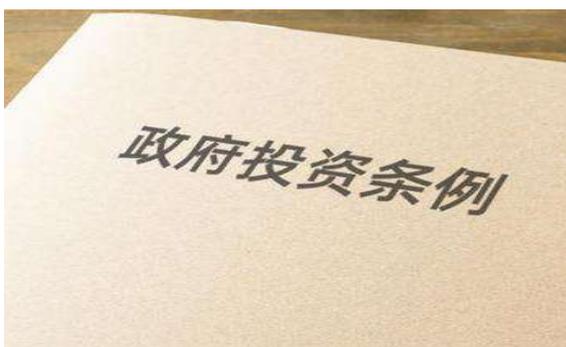
华为不惧战、敢亮剑，敢打一场反围剿，最终或能让美国晶片业丢掉市场、损失利润、再无持续创新的续战能力。华为的业务不止在5G，五年后市场规模或达5000亿美元，在管道、云、端、AI、车联网、物联网都有布局，全球没有多少企业愿意失去华为供应商资格，失去华为，或许就意味着终将被替代、被死亡。“以战止战”不仅是“上甘岭”战役的最大价值，也是现在针对美国全面封锁的最好战略。

任先生话锋一转：“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在山顶上拥抱，一起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博大胸怀：“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但是，握着拳头怎么能够拥抱？华美一战也许只需数年即见分晓，美国最终将被迫松开拳头、寻求握手。

结语：华为是中国科技的旗帜、产业的脊梁、国家的希望、民众的信心，也是全球产业链的机缘、协同创新的机会、合作共赢的机遇。但是，媒体对话现场全部是中国媒体，没有一个外国媒体，甚至也没有中国的英文网站，这更像是一场鼓舞士气、振奋民心的战前动员，而不是对外宣言。这对缓解甚至化解华为危机、安抚四海友商的帮助或许并不太大。为什么不用一场中英文双语、中外媒体齐聚的对话呢？道不外传，何以解惑、何以多助呢？静以安内，动以备战，以战止战，何惧也？

(2019-5-27 大公报)

《政府投资条例》 为政府职能清晰“划界”



国务院近日颁布《政府投资条例》，这部条例是我国关于政府投资管理的第一部行政法规。《政府投资条例》的出台，是我国政府投资法治建设的重大突破。此前很长时期内，我国政府投资领域主要依据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地方相关规定进行管理，相对而言权威性不足、指导性不够、约束性不强，而《政府投资条例》的颁布与实施，把政府投资决策、管理和监督等行为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轨道，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作用提供了更充分的法治保障。

《政府投资条例》从起草到颁布，历时已近 20 年。其起草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同时也是正式成文中最大的亮点，当属其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为政府职能边界主动划下清晰界线。

《政府投资条例》以基本法规制度形式，规定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领域项目。这样的规定对于中国这个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长期依赖政府主导下“高积累—高投资”增长模式的经济体而言，必然将释放出巨大而持久的改革红利。

政府投资于经营性项目，在特定历史阶段自有其必

然性乃至必要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类投资的弊端不断凸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其从整体上不利于中国经济效率提升，原因在于：

一方面，从其本身来看，政府投资的经营性实体（主要是国企）虽然已经历多轮改革，但其先天带有的产权虚置、预算软约束、多目标冲突等“国企病”，不仅在理论推演中，很难从根子上彻底矫正，而且在客观上，也确实导致了国企效率总体低于其他所有制结构的企业。

另一方面，政府投资于经营性项目还会产生相对隐性但影响范围更广的负外部效应，这主要体现在政府投资可能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而且更严重的是，由于政府这一出资人身份的特殊性，政府投资的经营性项目在与其他市场主体展开的竞争中，很难做到完全公平，因此就会干扰到市场自发秩序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导致市场资源配置与价格发现功能紊乱。

政府投资不再越位，也就意味着上述不利于效率提升的阻碍因素将逐渐消退，同时，政府投资不再越位的另一面，是政府可以在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及时地到位，为企业投资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譬如说：通过将有限的公共资金支出向民生保障领域进一步倾斜，有利于消除此前城乡居民基于预防性动机而不得不维持的过度储蓄倾向，进而从原点上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所以说，《政府投资条例》抓住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的又一项决定性成果。相信通过这次“划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将更为坚实，高质量发展的愿景也将更明朗地予以展现。

（2019 年 9 期 中国经济周刊）

以史为鉴：美日贸易战往事

当年，日本一直在妥协，没有做任何反抗，为了配合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日本主动限制出口，奖励进口，减少进口的种类，降低关税税率，简化通关手续。日本还对美国加大开放彩电和汽车等重要市场，签署牛肉、橙子贸易自由化协定，放宽流通领域限制。1986年，美日双方签订了里程碑性质的芯片产业协定，日本不但同意不在美国市场倾销芯片，而且还为美国的半导体产口在日本市场销售设定了20%的市场份额。这是历史的分界线，日本半导体产业就此阵亡。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打个平手的中国人不一样，当美国要同中国打贸易战时，中国并不会忍气吞声。这就是一个非主权国家，跟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区别。

一、野口见闻

野口悠纪雄永远忘不了自己4岁那年的东京大轰炸。那是1945年3月10日深夜，美国人的B-29轰炸机悄悄到来，东京高射炮部队只打出500发炮弹就被炸平，334架轰炸机亮着尾灯在1500-3000米低空飞进东京空域。

美军的空袭作战计划科学而周密，他们划定了东西5公里、南北6公里的长方形区域，在边界投下燃烧弹形成火墙，这样后边的飞行队伍就可以根据这个标志准确地进行轰炸。地面上的日本百姓被火墙堵住了逃路，野口悠纪雄的家就在这个长方形的西北角，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景况，很多人以为跑到水边就可以活命，都朝隅田川跑去，对岸的人也这样想，从那边跑过来，两边人潮在言问桥上挤成一团，动弹不得，这时美军投下了燃烧弹，听到一阵阵惊悚而恐怖的痛苦喊叫，桥上的人瞬间被烈火烧死，大桥两端的桥柱上，至今还残留着黑黢黢的痕迹。

东京大轰炸使日本10万人失去了生命。指挥这次空袭的美军司令官叫柯蒂斯·李梅，几个月前，他刚刚将德国名城德累斯顿夷为平地，炸起东京来十分熟练。日

本政府没有记挂这次仇恨，后来还为他颁发了奖章。大空袭结束后，野口家在废墟上跟其他东京人一样建起了棚屋，开了一家小小的百货店为生，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依靠朝鲜战争的战时特需完成经济起飞，加上工业国的底子还在，平均年GDP增长达到10%。

野口学习成绩优异，27岁那年，他获得福特财团的奖学金，决定赴美留学，当时从日本到美国的机票钱，是他半年的薪水，如果不是奖学金，他无论如何也读不下去的，就在他差一年拿到博士学位时，尼克松冲击发生了。二战结束后，美国人建立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法定兑换率为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同时各国锁定汇率，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变动幅度不得超过1%，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还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各国提供干预汇率时所需要的资金。日本在1952年加入IMF，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是360日元兑1美元。随后二十年，西德和日本经济狂飙，英国陷入慢性萧条，美国在越战中拖住了整个国家，前后共造成5.6万人丧生，耗资4000多亿美元，美国财政恶化，美元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也随之减少，美元发行量已经远远超过相对应的黄金储备，英美两国整体经济不如德日两国强劲，德日是国际贸易盈余国，美国是国际贸易赤字国，汇率没办法再固定化，外汇市场一直在抛售美元，购买德国马克和日元，美国被迫于1961年同德国修改汇率，让马克升值了5%，1970年马克又升值了9%，英国因为经济疲软，则在1967年对美元贬值了14%。

两次马克升值后，美国黄金储备还在减少，美国需要继续印美元维持战争，而他们的黄金储备又根本不够，因此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日，连国会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宣布，美元不再绑定黄金，停止美元对黄金的兑换。经济学历史上把这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叫“尼克松冲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塌了。



野口悠纪雄

第二年，野口的耶鲁博士课程就快要读完之时，在一堂经济学课上，一名同学突然站起来大喊“马克汇率正在变动”，从这时开始，固定汇率制正式转向了浮动汇率制，美元对世界其他重要国家的货币平均贬值了7.89%，日元兑美元汇率从360:1升值到308:1，IMF正式承认了浮动汇率后，日元兑美元再次升值到220-250:1。1972年夏天，野口回到大藏省上班，继续他勤勤恳恳的公务员生活，第二年10月，石油危机爆发，再次深深地影响到了世界格局。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只进行了20天，埃及军队起先在西奈半岛获得大胜，但他们没有趁胜追击，使以色列有时间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以色列军队随后反击，将埃及、叙利亚联军打得惨败，并将军队推进到离开罗仅101公里。阿拉伯国家痛恨美国一直在背地里支持以色列，战争结束后10天，10月1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沙特、科威特等波斯湾沿岸6国宣布将原油价格从原来的每桶3.01美元上调到5.12美元，涨幅高达70%，并且在以色列从占领区撤兵前，禁止向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主要就是美国）出口石油。到了12月，阿拉伯产油国再次将原油价格上调到每桶11.65美元。原油价格瞬间涨了4倍，导致全世界通货膨胀，汽油、煤油涨价，电力、食品、洗衣粉、电器都跟着涨价，1974年日本物价一年上涨了23%。

1974年7月某天早上八点，美国财政部长西蒙斯和副手帕斯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前往阿拉伯海滨城市吉达。他们将在那停留四天，织好那张天罗地网。西蒙斯首先见到了沙特石油大臣，也是欧佩克秘书长，提出如下建议：1. 美国向沙特大量购买石油。2. 美国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和武器装备。作为回报，保证今后OPEC石油交易只使用美元，沙特另需要将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谈判在谨小慎微中进行，帕斯基说：“双

方进行了多次慎重的谈判之后才敲定了所有的细节。”，只有一个小小细节双方分歧严重：沙特国王要求美国财政部对沙特购买的美国国债金额严格保密。美国答应了。

这个秘密被守护了40年，一直到2016年5月16日，美国财政部才首次公布了沙特持有117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数量。从这天起，美国和沙特的利益被紧紧绑定在一起，两国成为核心同盟国，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变化过。美元则通过绑定石油，开始一轮又一轮对世界财富的收割，保证美国有全球最好的经济环境，最强大的军队，最优质的人才。

世界经济史在这里被一刀劈开，野口则随着世界洪流冲刷着继续向前。1975年，34岁的野口被调去大学工作，这年4月，南越首都西贡被北越军队占领，美军撤离，越战终于结束了，刚过了4年太平日子，197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世界油价从12美元上涨到40美元一桶！而40年后，2019年油价也才70美元一桶上下浮动。

这次石油上涨给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世界各个发达经济体陷入低迷，日本却挺过了这段艰难岁月。野口回忆说，日本特殊的企业体制拯救了日本经济，使日本克服了通货膨胀。当时其他发达国家，企业工资根据企业与工业缔结的工资协定来决定的，协定中都规定如果物价上涨，工资必须跟着上涨，石油价格疯狂上涨后，所有物价都涨，就产生了通货膨胀，按工会要求，就要给员工加工资，员工工资增加，企业要把工资算进产品里面去，又形成新一轮物价上涨，结果又导致新的通货膨胀，一直这样恶性循环发展。

而日本的是由各企业分别成立的，工资一般与企业的业绩密切相关，大部分企业没有让工资随物价上涨的条款。日本人的观念是：“为了渡过危机，我们也应该忍耐，而不能提出太过分的加薪要求。”日本独特的公司体制使他们克服了其他发达国家在石油危机中的恶性通货膨胀循环，最早走出了石油危机，野口和他的同僚们，即将迎来日本闪闪发光的镀金1980时代！也即将迎来美国人的贸易战！

二、里根

美国人特别中意的里根总统，生于1911年。他父亲是一个烂酒鬼，有次大冬天他回到家，醉倒在家门口雪地里的父亲差点将他绊倒，才发现地上躺了个人。他老爸带着全家在美国四处颠沛流离，一直到他9岁时才在一个仅有一万人口的叫迪克森的小镇安居下来，由于他爸没什么贵（不）任（挣）心（钱），她妈内莉只好把家里的衣服缝缝补补，大的穿完给小的穿。1962年里根

加入共和党开始从政，在加州豪门的支持下，1966年成为加利福尼亚州长，两任州长期间政绩出色，1981年70岁时成为美国总统。美国人曾经在2015年评选最伟大的美国人，里根当选为第一名，主要因为他干过两件非常漂亮的事情：拖垮苏联、狙击日本。苏联的事我们放到一边，这里只讲怎么修理日本的。里根接手美国总统的宝座时，日本的气势看起来不可阻挡。

1980年时，日本的汽车产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因为当时石油危机，日本车更省油、皮实、耐用，大家纷纷选择日本车，逼得美国的克莱斯勒濒临倒闭，6万工人失业，五大湖企业纷纷破产。日本还在1970年代末就成为世界最大的DRAM生产国，半导体行业开始领先，日本人的电气公司NEC在日本个人电脑领域还击败了IBM，日本看起来生机勃勃，日本留学生在美期间都不怎么跟美国人玩，都是抱团在一起学习生活，因为“日本工资比美国高，反正回日本了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工作，不如现在就打好人脉。”

野口60年代去美国时，只有30万日元的年薪，当时美国顶级教授的薪水是1000万日元，野口感觉自己跟个土包子一样，没想到二十年后，日本的留学生就看不起美国的工资了。甚至美国人自己都觉得将来经济干不过日本人，198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的商品贸易赤字飙升至500亿美元，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工业中心承担了和日本的主要竞争压力，形成了今天的铁锈地带，失业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还写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这样的畅销书，全世界人民都觉得日本企业的模式比美国更先进。

里根可不这么想。在对内经济上，里根主张大幅减税、大力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缓货币增长速度（印钞慢一点）、减轻私企负担、扩充国防开支、实现预算平衡六大举措，号称“里根经济学”，这一套经济打法让美国随后保持了110个月经济增长，但也给美国造成了高赤字、高利率的隐患——2017年上任的特朗普总统，很多经济学举措几乎照抄偶像里根的方略，连用人都选里根的旧臣。而在对外贸易上，里根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开始强力压制日本。铁锈地带的州议员在国会首先发起了大量对日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在国会形成了政策基础，民主党更在众议院要求重振铁锈州的工业基础。美国政府各决策层都觉得应该要对日本动手，里根派出了性格强硬的莱特希泽，作为全面对日谈判的主将。你没看错，就是30年后，今天又在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美方负责人莱特希泽。

莱特希泽负责对日贸易战的时候，年仅39岁。他于

1947年出生于风气保守的俄亥俄州的医生家庭，是乔治城大学的法学博士，从小看着美国传统工业衰落，使他对全球化充满怀疑，这人性格坚毅、易怒、不知疲倦、保守理念根深蒂固，今年72岁的他依旧身形消瘦，因为他从年轻时就不喝咖啡，戒了烟，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跑步或者举重，晚上骑自行车，在世达律师所工作时，经常开着一辆风骚极了的红色保时捷去上班，他无比热爱NBA，哪怕一天要工作15个小时，还是坚持买NBA的季票，招实习生时，还特别喜欢挑一些大学篮球明星。

莱特希泽是一个顽固而锋利的人。他最早参与政治是因为担任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多尔的办公室主任，他在这里学习到了政治的平衡术，并在这里获益匪浅，“懂得掌控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系”，据30年前跟莱特希泽工作过的助手说，莱特希泽做事的方式非常简单，他会把一些要求写在一张纸上，然后用不容否定地语气递给助手说：“搞定它。”现在，轮到里根握住了莱特希泽的双手，告诉这位年轻的律师、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去搞定日本。

三、贸易战

在莱特希泽行动之前，美国已经进行过对日本出口的打压，1974年，《美国贸易法》制定了臭名昭著的301条款，条款规定外国立法、行政上违反协定、或者有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美国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通俗一点说，这个条款的意思是：谁要是让我们的企业没赚到钱，我们就用这个条款去制裁它。这项条款完全不把国际贸易法则放在眼里，想搞谁就搞谁。

从1976年开始，美国通过301条款，对日本发起过15起调查，包括汽车、钢铁、电信、半导体、制药等。比如钢铁行业，日本钢铁产量从60年代开始迅速增加，70年代就跟美国产量持平达到1亿吨，随后日本采用热效率更高的连续铸造法提高制造工艺效率，实现了比美国更低的钢铁制造成本，日本大量的低成本钢出口到了美国，美国发现玩不过日本的钢铁企业，他们没去改进技术竞争，而是通过301条款，强制要求对日本钢铁企业提高关税，1987年时，美国又玩不过低成本的本国电子产品，干脆对所有日本电子产品征收100%的关税。

每一个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都是从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起步的，1950-60年代，美国玩不过日本的纺织业，专门针对这些领域加征关税，1970-80年代，日本产业升级，加税对象变更成半导体、汽车制造等前沿领域。美国的态度是：竞争不过你的领域，加税。除了课征高额关税之外，美国政府还打着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禁止日本富士通收购Fairchild计算机公司，尽

管这家公司实际是法国人的公司，都不归美国管！美国还逮捕了日立6名高管，指控他们涉嫌窃取IBM技术。

1985年，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丹佛决议案”，几个月后，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在国会集结并发起了加收25%关税的贸易战法案。冲突甚至从日常制造业，转向了军工产业。1987年，东芝-哥尼斯保事件发生，美国指证东芝非法向苏联销售高技术国防产品，使其潜在损失达300亿美元，美国替日本承担了安全防卫和能源保障，日方却跟苏联做生意，美国国会集体气坏了，美日贸易战随后升级。1988年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包含超级301条款的1988综合贸易法案。

1989年老布什执政后，在对日钢铁、汽车、半导体等贸易摩擦中，都曾动用过该条款。

但不管美国怎么用加关税来制裁日本，两国贸易逆差反而还是在加大，美元从1980年到1985年升值了60%，这种情况下只能加大进口，减少出口，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在美国的打击下居然从1980年的364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1485亿美元。足足增长了三倍。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贸易战，日本当时怎么反击的呢？日本没有任何反击。跟今天被美国挟持着打贸易战的中国不同，双方打得有来有往，当年的日本，至始至终，任由美国疯狂进攻，一个字都不敢多说。莱特希泽在跟日本代表团谈判时，会傲慢地将对方文件折成纸飞机扔给对方，是完全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表现，现在许多文章会写什么“日本代表团方寸大乱”，突出莱特希泽的谈判艺术，这样的描绘实在太愚蠢了。日方代表团每个人几乎都是国家派出来的优秀代表，怎么可能被扔个纸飞机就乱了方寸，实际上，莱特希泽的傲慢就是美帝国对一个属国的傲慢而已。日本的土地上，驻扎着5.2万名美军及其家属，共约10万名美国人，日本政府每年要花费70亿美元养活这些人，如同野口永远记得东京大轰炸的恐惧记忆，日本人对美国人如同天神一般敬畏，他们绝不敢招惹美国。

而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打个平手的中国人不一样，当美国要同中国打贸易战时，中国并不会忍气吞声。这就是一个非主权国家，跟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区别。日本一直在妥协，没有做任何反抗，为了配合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日本主动限制出口，奖励进口，减少进口的种类，降低关税税率，简化通关手续。日本还对美国加大开放彩电和汽车等重要市场，签署牛肉、橙子贸易自由化协定，放宽流通领域限制。1977年，日本自愿对彩电出口进行限制，1981年，日本自愿限制汽车零部件出口，1980-90年代，日本还对美国开放了电信业。

1985年，美国指责日方存在倾销行为，对日本的电脑、电视等高科技产品征收100%的关税，1986年，美日双方签订了里程碑性质的芯片产业协定，日本不但同意不在美国市场倾销芯片，而且还为美国的半导体产口在日本市场销售设定了20%的市场份额。

这是历史的分界线，日本半导体产业就此阵亡。根据《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作者西村吉雄的记载，在美国打击日本DRAM产业之前，日本当时已经将美国的英特尔、AMD打得溃不成军，半导体芯片领域已经完全是日本企业的天下。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是靠投资驱动研发，做大一点，找点投资，再做大一点，再找点投资，日本是后发国家，直接政府驱动，倾国力追赶，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要在半导体芯片上超越美国，通产省（野口第一次考上的部门）把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东芝都叫到一起开会，要他们整合产学研半导体全部人才，举国之力追赶美国，日本半导体开山鼻祖垂井康夫带领日本企业摒弃门派之别，在九州岛搞起了日本人的硅谷，4年时间搞出上千件专利，1980年拿下30%的半导体内存市场，1985年拿下全球50%的内存市场，一下就超过了美国的硅谷精英。美国人派人去日本公司考察，回来垂头丧气，日本人当时一幢楼在做存储芯片研发，第一层楼的人研发16K容量，第二层楼的人研发64K的容量，第三层的人研发256K的容量，美国人根本追不上。

在日本人的疯狂进攻下，1981年AMD亏损1100万美元，1982年英特尔裁掉2000名员工，1985年干脆退出DRAM存储业务，共亏掉1.73亿美元。硅谷半导体行业协会的大佬们最后只好去哀求美国政府出面救命，说超级武器必须有超级电子技术，超级电子技术需要最新半导体技术，如果美国的半导体完了，美国以后的军工就完了。美国政府被吓得不敢，于是出现了1986年的芯片产业协定，日本芯片产业轰一下被击倒。日本人倒下后，因为硅谷超过7成的科技公司砍掉了DRAM业务，韩国人赶紧抓住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游说克林顿政府只给韩国0.74%的半导体反倾销税，而给了日本100%的反倾销税，韩国半导体从此无比鸡贼的崛起，日本则从此失去这一块重要的科技市场。

日本半导体研发专家汤之上隆在自己的著作中气愤地说：“这实在是欺人太甚！”美国通过贸易战，有效的阻止了日本向部分高端产业迈进，但整体上，美国还是无法阻挡大量日本制造进入美国，美国贸易赤字规模还是从1980年的360亿美元增长到了1989年的1700亿美元，贸易赤字在GDP中的占比同期从1.3%扩增至3.7%。

面对如此搞不定的局面，美方只好出动了他们最后的大杀器：广场协定！

四、广场协定

和流传中的信息并不一样，莱特希泽并没有参与《广场协定》事宜。里根邀请他担任贸易谈判副代表时的任职时间是1983年4月12日至1985年8月16日，在这之后，他离职去了世达律师事务所，离职时，白宫称赞他是“钢铁老兵”，这位老兵一直等到三十年后特朗普重新召唤他，才重新回到白宫。据《管理美元》的作者船桥洋一透露，实际操盘《广场协定》的，是新任财政部长贝克。美国一直指责日本操纵汇率，称日本政府故意让汇率远低于美国，让日本出口商享受不公布的贸易优势，但其本质其实是里根实际的强势美元政策，才使得日元对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在235:1左右。

在广场协定签定前三个月，1985年6月起，美国就跟日本陆陆续续在谈汇率的问题，里根个人信奉“美元强则美国强”的策略，莱特希泽的上司布鲁克和内阁成员建议过美元贬值，但里根一直不为所动，西德、法国、英国也觉得美元过高，希望小幅贬值，贝克去找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聊，大家一拍即合，贝克还准备了对日本全面实施高关税的方案，逼迫日本坐到谈判桌前，谈了三个月后，美日德法英五国在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签署了影响后世的《广场协定》，五国政府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

问题是，这次美元贬值一点也不有序，事情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料想。9月24日，日本银行根据广场协定开始抛售美元，市场一片混乱，一天时间日元兑美元升值了20日元，各个企业总部与分社电话量激增，造成长途电话瘫痪了两小时，一年后，日元上涨了60%，1987年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日元升值导致日本普通人突然很有钱，80年代原本为8%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率在1983年降至2%，1986降为负值，但同时也重挫出口行业，1986年日本出口总额从上一年度的41.96万亿日元下滑到35.29万亿日元，降幅高达16%，1987年，日本出口总额33.31万亿日元，比广场协定之前的1985年下滑了20%。

从这时开始，急剧上升的日元使日本进入了著名的“虚假繁荣”阶段，日本出现了不可控制的地价上涨的苗头。野口当时已经成为日本有名的经济学家，1987年他是第一个在文章中对日本经济使用“泡沫”这个词的人，他到处著文说我们房地产有泡沫，情况十分危急，但根本无人理会他。整个日本陷入了纸醉金迷，很多欧

美发达国家的女生跑去日本陪酒淘金，全日本工资奇高，当时偷渡去日本打工的人回忆，在日本只要干一周，收入相当于在中国干一年，而在东京街头，打的的人都要挥舞着手中的万元大钞，的士司机还不一定拉客。奢靡之气弥漫着整个日本，日本人买走了当时全世界70%的奢侈品。纽约第五大道名牌店里全是日本人，法国的百货公司被逼对日本人限购，怕他们将所有货品清仓了，日本每个高中女生都追求有几款最新的名牌包包，为了赚钱，13%的女生跑去做援助交际，日本人管那段日元高企，物质丰富的奢华时代叫“刹那主义”。

日本人富到到处去买美国的资产，1986年第一不动产公司买下了纽约的蒂芙尼大厦，1989年三菱地所买下了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14栋大楼，1990年宇宙中心公司买下了加利福尼亚著名的避暑胜地圆石滩，野口1960年代刚去美国时就在这里参观过，他当时被这里的富裕和美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不想二十多年后日本人竟把这里买了下来，野口说自己“一时竟有恍如隔世之感”。1985年日本对美国不动产投资19亿美元，1988年增至165亿美元，1989年底，日本土地资产总额约为2000万亿日元，是美国全国土地资产总额的4倍，所以有日本狂妄宣称“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只用皇居的土地就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

但他们并不知道，房价即将破裂。野口还在努力地宣扬他的泡沫论，他苦口婆心地对认识的人讲日本房地产泡沫有多严重，还去劝日本自民党高官注意房价，那高官却说“我选区的地价也终于开始上涨了！”。1989年12月，号称“平成鬼平”的三重野康就任日本银行总裁，三重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去拜访过野口，深知日本活在虚幻的浮华里，这个泡沫越早刺破，日本摔得越轻，经过深思熟虑，三重决定主动刺破泡沫。

1989年美联储开始加息，1990年开始，日本银行开始上调基准利率，3月上调1%至5.25%，股价应声下跌20%，8月上调至6%，就在这个月，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大家都预感又要爆发石油危机了，纷纷抛售股票，日经股价疯狂下挫33%，降至最高值时的一半，到1990年1月12日，日本股市暴跌了70%。股价下跌时，地价并没有跟着下跌，甚至在1991年5月颁布“地价税”后，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价格还在上涨，日本人拮据相庆，认为土地价格不像股市，根本没有泡沫，但到1991年下半年，东京住宅用地就开始猛地下跌14.7%，随后东京房价最多跌去了70%，直到今天日本房价还只有当时的50%。房价硬着陆让日本接盘侠遭到灭顶之灾，有日本职员花5500万日元在市中心买了套老破小，首付1000万，

贷款 4500 万，股市重挫下被解雇，这位职员就背负了巨额债务，还到 2019 年还没还完。

地产泡沫崩溃后，日本土地资产大幅缩水，从 1990 年到 2004 年，14 年下降到只有过去的三分之一，除城镇外，包括耕地、山林在内的土地资产总额由 1990 年的 2452 万亿日元降至 2004 年的 1245 万亿日元。大量人群破产以及金融诈骗案出现，富士银行有职员伪造存款证明从金融机构获得巨额资金拿去买房投资，某高级餐厅女老板从金融机构获得数千亿元贷款进行房地产投资，房价崩盘后只能走向诈骗。这样的社会事件给金融机构留下了大量不良债权，截至 2003 年 3 月底，国民负担高达 10.43 万亿日元，平均国民每人负担 8 万日元，每个家庭负担约 40 万日元的债务。

五 软着陆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能看到的信息全是对日本大泡沫破裂后的恐惧感，或者讲日本泡沫后社会的消极影象，看到这种论调我总是十分不解。

1995 年，房地产崩盘四年后，日本人均 GDP 还是美国的 1.5 倍。

就是到了 2018 年，美国人均 GDP 为 6.25 万美元，德国 4.8 万美元，日本还是 4 万美元，韩国是 3.2 万美元，中国是 9900 美元左右，日本依旧是亚洲大国里最高。30 年过去了，日本经济依然屹然不倒，虽然说这三十年日本确实在原地踏步，但日本这三十年的国民生活水平依然是亚洲最好的国家之一。

日本在房地产泡沫后创造了两大奇迹：

一是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到 2017 年，日本在海外净资产为 1000 兆日元，约为 58 兆人民币，27 年蝉联世界第一（海外净资产第二名是德国），据大型顾问公司 RECOF 统计，光 2017 年度日本共有 687 件海外企业合并或收购，金额达 5100 亿元人民币。日本海外 GDP 是本土的 1.5 倍，所以本土就算负增长，依然能保持稳定。

二是日本一直将拥有先进的制造业做为国家根基，在汤木路透评选出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里，日本以 40 家企业数量排在第一，美国也只有 35 家，其中松下公司由传统消费电子已转型到汽车电子、住宅能源领域，夏普转向机器人、健康医疗，索尼转向高精摄像等等，2017 年，美国全年研发投入是 4960 亿美元，占全球研发投入的 26%，中国全年研发投入是 4090 亿美元，占全球的 21%，已经降到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研发投入还能达 1670 亿美元，可见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政府和企业债务扩张，大量投入到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中，最后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体系和全球领先的跨国企业。

六、警醒

日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今天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有着巨大的警醒作用。第一，今天美国对中国疯狂进攻的手段，就是当年对日本进攻手段的重演，特朗普是里根的超级粉丝，他几乎将里根对付日本的方式全部重新用了一遍，不管是对某些行业加征关税，还是妄图逼迫人民币升值，都是过去用过的手段，为了执行到位，还将莱特希泽特别请了回来，而莱特希泽还是像对付日本一样强硬，在这次特朗普发布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提升到 25% 前，相对温和的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和莱特希泽吵了两天，最后特朗普还是同意了莱特希泽的方案。第二，美国对我们是异常强硬的态度，不要对美方抱有任何一丝美好的幻想。当初打自己的小弟时，美国都连东芝高管都抓，活活整死日本的高科技半导体行业，今天同样在加拿大抓孟晚舟，全面封杀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对他们形成巨大危险的华为公司，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美国要做的就是将中国死死钉死在中低端产业链，不容许中国爬到世界产业链高端，现在美国不仅封杀华为，所有中国高端科技行业，能源企业，医疗制造开发行业，都有可能被美国列入打压名单。美国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三，中国和日本国情不同，日本是美国的小弟，被打就只能忍受，完全不能有任何反抗空间，中国是独立主权国家，可以自由反击美国，大家要记住，你不反抗，美国打你，你反抗，美国还是打你，在这种情况下，宁肯反抗给美国造成巨大杀伤，也不能低头再像日本一样忍气吞声，要让美国知道，这世界上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容忍它为所欲为的。第四，日本在经过美国疯狂打压后，还能保持经济高度繁荣到今天，其国际化的宏观布局和一直保持高精尖工业发展路线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就是在做国际化布局，5G 技术就是我们抢夺工业 4.0 的钥匙之一，国家要长久繁荣，要向日本学习他们优秀的一面，挺过美国这一波狂攻。

美国今天对中国的贸易战不是一朝一夕的战争，一定是 5-10 年的大战，美国今天的国际地位也开始明显下降，特朗普的里根经济政策也使美国国债危机在愈演愈烈，此时不宜妄自菲薄，只盯着美国有多强大，日本当年都能保住国家繁荣实现软着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强敌就在眼前，我们当初那么弱小，都能在朝鲜战场痛击对手，今天又有什么理由，不让美帝付出惨重代价。中华儿女并不愿意打响贸易战，但虎狼到来之时，我们已经磨好了手中的刀枪。

(2019-05-26 卢克文工作室)